

# 逆全球化、再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袁堂卫 张志泉

---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科学阐述了工业革命以降世界历史发展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世界历史的主线是民族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动力是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斗争；世界历史的形态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二元分立。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是对西式全球化形式上的表象否定，在逻辑上绝非天然的“反资本主义”或自然的“社会主义路向”，相反，其实践旨趣是要重构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中国出场下的“再全球化”是对西式全球化本质上的根本否定，扬弃了资本逻辑的非理性内核，创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全球运作、全球流动，是一种新型的“包容性全球化”，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范式，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关键词】**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 逆全球化 再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袁堂卫（1979-），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山东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讲师（山东日照 276800）；张志泉（1966-），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100）。

---

正确解答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趋向、实现路径、形态范式，需要科学理论和伟大实践的指引。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着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科学阐述了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世界历史的主线是民族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动力是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斗争；世界历史的形态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二元分立。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是对西式全球化形式上的表象否定，在逻辑上绝非天然的“反资本主义”或自然的“社会主义路向”，相反，其实践旨趣是要重构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中国出场下的“再全球化”是对西式全球化本质上的根本否定，扬弃了资本逻辑的非理性内核，创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全球运作、全球流动，是一种新型的“包容性全球化”，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范式，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逻辑结构

虽然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未明确提出“全球化”概念，但是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客观的历史过程，并重点立足政治经济学的视阈，在“世界市场”的阐述中论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系统、发展规律、演变形态等一般性的逻辑建构，从而为超越各种主观考察经济全球化理论与实践的发生学逻辑，建立了科学严整的起源学分析框架。

## 1. 世界历史的主线：民族国家的经济全球化

民族国家以经济全球化为内嵌，由“区域场所”迈向“世界市场”，最终构筑起“全球空间”，是世界历史的一条叙事主线。马克思从历史、现实、未来的三重维度，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现实二重性、未来多样性。

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诞生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使民族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大工业是超越了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深刻的生产性变革，在助力资产阶级完成“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sup>①</sup>历史使命的同时，又天然地刺激了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资本欲望，驱使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sup>②</sup>，最终资本“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历史行动造就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生动描述了“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中心、落后民族国家——边缘”的经济全球化图景：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生产资料由世界供应，生产产品被世界消费，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③</sup>。

第二，资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特性，使经济全球化呈现文明和野蛮的二元色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既具有一般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特性，又具有映射资本主义特殊阶级逻辑的生产关系特性，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经济关系的世界市场呈现，或者说，是“资本世界市场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sup>④</sup>。因此，在当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统摄作为生产力的资本时，资本便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sup>⑤</sup>，相应地，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作用就表现为文明和野蛮的二元色彩。一方面，“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对世界历史产生“伟大的文明作用”。比如把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和人才等各类资源的流动、流通时间无限趋近于“零”；资本和技术混合的全球价值链，使各国在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精神共享等环节的上下游实现“高度融合”，从而为世界历史的进一步深化奠定科技、思想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疯狂地追逐利润”，又使“现代的灾难”日益凸显。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殖民侵略、资源掠夺、战争屠杀等积累原罪，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则主要表现为国际金融危机、逆全球化等经济霸权。

第三，世界体系中依附结构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态建构于“中心”与“边缘”力量对比的时代变迁。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国家凭借对非西方国家的绝对优势和殖民征服，掌控了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专利，“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sup>⑥</sup>。而在21世纪的今天，伴随中国、印度、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崛起，西方国家对世界体系的控制力大幅衰减，因此，探索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尝试、社会主义主导、社会主义创造，不仅理论上可行，更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④ 张三元：《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6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861页。

## 2. 世界历史的动力系统：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对立统一

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是支配民族国家由“区域”走向“世界”，经济发展由“局部”走向“全球”的内在驱动，也是分析、评测经济全球化未来形态和可能向度的基本工具。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揭示出驱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动力并非休谟所指的人的一致性本性或黑格尔主张的绝对精神的外化，而是两个“普遍”：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造就了冲破民族和地域堡垒的世界市场新空间、全球化空间，并促进了各民族国家间的普遍交往。这一动力背后蕴涵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的对立统一。

资本的增殖逻辑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是指资本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致的必然规律与必然趋势：资本激发和催生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生产力，然而生产力日益挣脱资本的桎梏，并将资本统治推向必然灭亡的未来趋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资本的本质是利润增殖的社会关系，载体则是生产要素。资本不仅造就了资产者天然的宰制优势，获得了对劳动者的普遍奴役和压迫的权力，也造成了世界市场体系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与控制，“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极端伪善和他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sup>①</sup>。

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是世界历史的副线，是资本逻辑的政治拓延，是指在资本逻辑的指引下，民族内部的社会交往与政治集中日益强化，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博弈日益激烈，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一国内部及诸国之间分别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支配结构。概而言之，双重逻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力作用于世界历史的现实构筑之中。其中，资本逻辑是主要逻辑，从根源上推动着民族国家逻辑的展开，而民族国家逻辑是次要逻辑，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展开，并通过国家权力的异质性运用遮蔽、扬弃、解构、否定资本逻辑的发展，演绎出资本主义主导的西式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主导的中式全球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形态。

## 3. 世界历史的演变形态：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二元分立

在马克思的视阈下，世界历史不是等同于某一制度的恒定概念，不带有独属于资本主义的标签，而是人类社会为完成民族国家由“区域”走向“世界”，经济发展由“局部”走向“全球”的地理跨越和空间冲破，而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历史进程。因此，马克思虽然承认“历史世界化”的资本主义起点，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理想形态，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sup>②</sup>。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不是仅有资本主义这一唯一的主体性力量，社会主义的进场和在场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应然。2017年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演讲中，在全面而深刻地把握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的中国担当，并全面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sup>③</sup>，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持久的生机和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和当代的实践证明，西式全球化的完结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两次否定。“逆全球化”思潮是对西式全球化形式上的表象否定，中国出场下的“再全球化”是对西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

② 王继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及其意义》，《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③ 参见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全球化本质上的否定，构成了对西式全球化的根本超越。

## 二、资本主义主导下逆全球化的当代批判

西式全球化的终结开源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200多年资本关系逻辑的野蛮扩张，终至沦落到欧美资本主义自身社会结构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于是逆全球化思潮成为当下西方流行的话语范式。作为一个解构性的概念，逆全球化在语义学上似乎存有“全球化根本逆转”的意境，但管窥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双重逻辑——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的逻辑，逆全球化只是对西式全球化形式上的表象否定，而非关系逻辑的根本扬弃，更不存在天然的“反资本主义”或自然的“社会主义路向”，而是在“全球化”向“再全球化”的转向中，西方“现代化输家”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旨归，以地方和国家空间回缩为表征，以政治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军事单边主义、生态孤立主义为技术框架的“帝国”利益单向构建。“帝国”利益单向构建的主旨不是根本性的“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相反真实的本意在于对抗“再全球化”，复兴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重建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

### 1. 逆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资本逻辑

经济全球化的展开是深刻的“地理性事件”<sup>①</sup>，资本作为“天生的国际派”<sup>②</sup>，不仅在物理意义上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甚或造成“用时间去消灭空间”<sup>③</sup>的时空压缩，更在制度意义上建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因此资本逻辑是经济全球化历史性出场的内在动力和支配法则。但由于资本的二重性矛盾，经济全球化内生地制造出自我否定的“反体系运动”即“反全球化”，在近代表征为地方保护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对工场手工业一直是采用保护的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sup>④</sup>；在当代则表征为对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抵制，也就是“逆全球化”思潮。

(1) 经济全球化的三次资本浪潮。按照资本形态的变迁，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演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500—1800年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阶段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此时资本尚未形成一种独立的经济关系，而是以金银货币的原始形态存在，因此这一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是金银。第二，1800—1990年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阶段是西方工业资本对外扩张的时代，突出标志是大量跨国公司和对外投资的形成及剩余产品的输出。工业文明具有批量生产、易于复制、不断增殖的特性，因此西方为实现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廉价资源和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不断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在造成跨国企业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导致西方制造母国制造业萎缩和“产业空心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的制度根基。第三，1990年后延续至今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阶段是金融资本、虚拟资本至上的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在WTO、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垄断优势和美元霸权，推进股票、期货、房贷证券、信贷消费等金融创新及跨境金融并购，金融资产成为西方的

① 参见门洪华、李放：《正在发生的未来——新全球化洪波涌起的时代逻辑》，《中国战略报告》（第五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② 参见焦建华：《试析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结构的分析及其发展》，《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1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4页。

核心软实力。以美国为例，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 GDP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 40% 左右，表明美国主要依靠金融支撑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2) 逆全球化的资本动因。如前所述，金融资本是当代资本的最高呈现形式，它具有冲破虚拟和现实的时空壁垒，建立资本积累金融化的优势。然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震荡至今的钟摆效应也力证，金融资本的过度虚拟化、泡沫化、流动化，极易引发实体经济空壳化、日常消费借贷化、国家走向债务化、人民大众贫困化等诸多问题。更为严峻的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70 多年金融资本的不断累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从下到上的次序和比例为：物质生产形态的实体经济<债券、股票和商品期货形态的基础性虚拟经济<金融衍生品形态的纯粹虚拟经济。“倒金字塔”结构预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十分脆弱，极易发生整体性崩溃。

面对时下资本主义经济“倒金字塔”结构的痼疾，特朗普带头发力，发动了一场以“控制资本流向”为主旨的自救运动，即“逆全球化”。一是“以守为攻”，重建资本主义的基石力量：产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提出了“雇美国人，用美国货”的“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综合运用政策优惠、取消关贸协定、征收关税等软硬手段，强力促使外迁海外的传统和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防止高技术扩散，保持美国科技的全球优势地位。在一系列组合拳之下，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非常明显。数据显示，2017 年美国制造业扩张速度达到 13 年来的新高，就业指数也攀升至 6 年来的新高。二是“以攻为守”，主动采取贸易与投资限制措施，限制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内的产业并购、金融投资，构筑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资本单向流动。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显示，2008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美国施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 1191 项，占 G20 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量 6616 项的 18%，居全球首位<sup>①</sup>。三是“攻守兼具”，一方面继续深化本土制造业结构性复苏的“守势”，另一方面利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核心技术专业化生产的绝对优势，以产品断货、技术下架、出口禁令等进攻性姿态，逼迫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为“美国制造”创造市场机遇。

由是观之，逆全球化的内在驱动依然是资本逻辑，是以重构西方全球经济宰制为旨归、以地方和国家空间回缩为表征的资本单向流动。从本质而言，逆全球化的真正目标不是“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要重建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

## 2. 逆全球化的实现力量：民族国家逻辑

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的真空流动，而是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至上，以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建构为内核的复杂博弈。从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国家博弈始终是经济全球化无法超越的历史法则。1500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以欧洲为主体，描述的是与殖民化相关联、以对外贸易为动力的全球体系，反映了欧洲对当时世界的支配及其价值“正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版图的实现是美国与多国激烈博弈的结果，反映了美国全球霸权及以美国标准改造世界的“合法性”。

不同于近代的殖民霸权、现代的帝国霸权、战后的控制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构筑的领导霸权是一种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的新型统治结构，是一个有中心、无疆界、有等级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帝国权力的运作呈金字塔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军事母国—跨国财团—普通公众”。最上层的是冷战结构解体后掌握了全球武力霸权的美国。对悖逆及危及美国利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美国会冠以“恐怖主义”“邪恶国家”的标签，给予军事恫吓、威慑或打

<sup>①</sup> 参见 WTO, “Trade Statistics and Outlook: Trade in 2016 to Grow at Slowest Pac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No. 9, 2017.

击。第二层由跨国财团及臣服于跨国财团的民族国家组成。跨国财团以多层网络的形式控制全球市场。臣服于这些跨国财团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在政治上遵从顶层全球霸权的运作原则，另一方面以此为筹码与跨国财团交换国际资源。第三层主要由世界各国的普通公众构成。

通过军事威慑、经济控制与阶级压迫的复合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几乎赢得了对所有大国的胜利，构建了一个美国为王的帝国体制。针对西欧诸国，采用全面的合作方式，共建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关贸总协定，共谋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针对苏联及东欧诸国，采用冷战的竞争方式，促使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制度解体，被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针对中国，采用“接触+遏制”策略，促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由此观之，经济全球化体系是一个以西方霸权为中心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帝国体制，“民族/国家的统治权力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统治权力这一权力事实本身的衰落……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就是所谓帝国”<sup>①</sup>。美国为王的帝国体制，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之源，也是特朗普政府推行“逆全球化”的有效凭借和实现力量。

### 3. 逆全球化的必然向度：资本与民族国家的双重否定

当前，对于逆全球化的批判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应从“帝国”利益单向构建的维度，考察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国家主导性、社会共识性、预谋规划性、有序组织性以及系统全面性。应该认识到，逆全球化思潮不是英美等西方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性否定或摒弃，更不是所谓特朗普“疯子式”的盲动主义，而是“美国为王”的帝国体制基于现实主义原则对“西方主导型全球化”的战略性回归和系统性重建，是一个包含“共识”“软实力”“硬实力”“自然空间”的系统性技术框架。

第一，政治民粹主义为美英等国“逆”流而上，强力回归民族主义、强势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社会共识和行动口实。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既有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也有蓄谋的政治诱因。西方国家或政党为掩盖金融危机暴露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和自身治理能力危机，有意将劳动群体的怒火引向经济全球化，并加以大力迎合，造成了政治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兴起。美国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德国新选择党等国家民粹主义则借政治民粹主义之口，堂而皇之地以国家意志名义推行“反自由化、反全球化、本国优先”策略，既轻松转嫁了责任，又获得了高支持率，稳固了政治统治，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政治治理的反动、腐朽和无能。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是逆全球化的主要手段。其思路是凭借美国在市场、科技、研发上的超强“软实力”，以中美巨额贸易逆差、中国贸易壁垒、欧盟钢铁倾销等为操纵议题，利用“301调查”等国内法，挑起1对N的全球贸易战，发动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绞杀战，既减缓、阻滞他国商品总量的出口和增长，又遏制、防范他国经济质量的创新和崛起，最终确保美国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的全球独霸。

第三，军事单边主义是逆全球化的次要手段。其思路是假如经济软实力难以完成美国所期待的利益诉求，则采用武力恫吓、军事干预等威慑策略，进行极限讹诈，摧垮对手与美国进行经济贸易战的决心和意志。如在当前与中国贸易战的对决中，美国频繁以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为幌子，为贸易战做军事助攻。

第四，生态孤立主义为西方制造业回流提供了发展的自然空间。长期以来特朗普认为，气候变

<sup>①</sup>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

化是美国的对手们编造出来的“骗局”，目的是让美国制造业缺乏竞争力，而《巴黎气候协定》是以美国工人及纳税人失业、减低收入、关闭工厂以及大幅减少经济产能为代价的，因此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意图只有一个：为将来摆脱对中国制造依赖，重振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做自然准备，因为发展制造业要排放大量的污染物。

### 三、社会主义主导下“再全球化”的当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第一次创造出社会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形态，正有力地矫正着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迈向，推动着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时代转换，为人类社会走向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再全球化”范式。

#### 1. “再全球化”的现实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

无论“旧”的自由主义全球化、“逆”的保守主义全球化如何“变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功能’只会把全球化打造成为‘中心—外围’板结的利益结构、等差层级森严的权力结构、‘先进—落后’之别的文明结构，实际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体系进程，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进步典型性特质”<sup>①</sup>。因此，回视西式全球化的自反性特质和衰落史，积极寻求另一强大异质力量主导构建更具公平性的新型全球化，是未来“全球性”价值本性不断彰显的唯一进路。

“再全球化”的时代图景显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空中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形态中建构经济全球化，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新的空间格局、要素构造、未来向度。第一，中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空间格局，将经济全球化“二元分立”的对抗格局转换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三元互通”的普惠格局，以中国为连结介体的三个世界互联互通，超越了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有利于缩小“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差距<sup>②</sup>。

第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创新了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构造，变传统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输出，使支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由盲目的资本逻辑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进步力量。

第三，中国的政治主张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向度，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然而各方利益共同体唯有建立在公平、平等的基础上，才有意愿、有能力打破壁垒，推动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有效配置，中国一直倡导、奉行“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从根本上为真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来临提供了保障。

#### 2. “再全球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发展

中国作为“再全球化”的构建主体，一方面要勇于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塑造，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社会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塑造。因此，在世界历史的双重逻辑上表现出理论承继和创新发展的双重特性。

首先，中国主导的“再全球化”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场域推进。“再全球化”时代正处于完全以资本和民族国家逻辑支配的虚假的共同体，走向全面扬弃资本和民族国家逻辑支配，构建人

<sup>①</sup> 门洪华、李放：《正在发生的未来：新全球化洪波涌起的时代逻辑》，《中国战略报告》（第5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页。

<sup>②</sup> 参见王栋、曹德军：《中国引领世界进入“再全球化”进程》，《人民论坛》2017年第32期。

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其次，从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逻辑的阶级属性看，中国主导的“再全球化”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制度升级。在资本逻辑上，“再全球化”坚持辩证的扬弃，既推动资本的全球运作、全球流动，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限定、节制资本应用的范围和空间；在民族国家逻辑上，“再全球化”平抑了全球“二元格局”的等级差距，创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空间”的全球大同经济，因此就实践旨趣而言，是一种新型的“包容性全球化”。

### 3. “再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运作

(1) “以人民为中心资本运作”的独特创造。当代西方社会陷入总体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经济领域有节制、有原则、有底线的利用资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以人民为中心进行资本运作”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排斥资本的利用。在很长一段时间，资本被视为独属于资本主义的专利，同社会主义是根本绝缘的，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第一，就资本的运动而言，因为劳动二重性的必然存在和社会主义“劳动还是人的第一需要”的现实存在，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sup>①</sup>，并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空间联动”。

第二，就资本逻辑的打开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sup>②</sup>而是要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肯定资本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扩大商品生产规模、激活其他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进步作用，从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九大重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强调不仅要善于资本投资、资本运作、资本经营，更要善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扩大国内开放和国际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视资本的监管。资本是一把“双刃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的指出，资本作为剩余价值的增殖物，映射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异化本质与奴役剥削的生产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待资本，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即：可以资本运作，但不能“资本通吃”。一方面允许、放宽、扩大资本运作的空间和范围，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支持国内企业出海投资，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又把资本运作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防止资本逻辑对政治、社会、文化、民生的控制和绑架。即便在经济领域，也积极采取法治、市场等多种手段防范化解资本风险：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决反对资本围猎权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自由竞争打破资本垄断。通过两手抓、两手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起人民利益第一性、资本利益第二性；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经济利益格局，推动资本导向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导向的全球化、资本逻辑的全球化转向人本逻辑的全球化。

(2) “以人民为中心资本运作”的理论机理。“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运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创造，在哲学、历史、现实三大维度上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是符合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是一种落后的存在，它也有文明的一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在尚未达到自身的历史普遍性之前，仍然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历史形式，具有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对资本的扬弃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1页。



终目的绝不是要建成资本主义，相反是为了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二是符合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不仅在于科学思想的正确指引，更扎根于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积累之上，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因此，面对空前严峻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力量优势，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益成分，让资本为“社”所有，被“社”所用，成为战胜资本主义的强大驱动力。

三是中国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动态地实证了这一进路的可行性、正确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手段，走出了一条独具社会主义特色的消解、否定资本逻辑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将政府代表的公共意志注入资本意志当中，由政府引导和控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不仅极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而且实现了对资本扩张负面效果的有效可控，极大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享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 4. “再全球化”的实现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逻辑

“再全球化”的图景实现取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和对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等现代性危机的智慧超越。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实现，提供了安全支持、发展支持、文化支持。

第一，在国际安全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经济全球化营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鲜明和平属性的安全倡议。一是在安全理念上，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等对抗性思维，主张各国互信、互利、互谅，注重本国与外国普遍安全、总体安全的系统打造和有机兼容，推动各国平等相处，共创和平。二是在安全维护上，不轻易诉诸于武力，不热衷于“热战”“冷战”“核战”，主张利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G20等多边国际议事平台对话协商，推动各国化解矛盾，管控分歧。三是在安全态势上，不追求“东风压倒西风”，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求同存异、共用资本、利益互惠，使彼此经济交互、自由贸易、和平生长，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第二，在全球经济维度，“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构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健康的发展药方。“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领域的空间拓延，是具有强烈发展属性的中国方案。一是推动周边国家协同发展，为被西方长期视为“黑暗的远方”的中亚、南亚、北非等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普惠性的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提供了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制度机遇，有效平抑全球“二元格局”的等级差距。二是推动资本形态全球转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注重金融资本，不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制造金融泡沫；“一带一路战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让投资回归实体经济，牵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牛鼻子”，为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道路和模式。

第三，在世界政治维度，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引领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先进的文化支持。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领域的生动演绎，是具有高度文明属性的政治倡议。一是超越了推崇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sup>①</sup>，中国在政治交往中，摒弃丛林法则、零和博弈、霸权稳定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以实力论成败、不以贫富论输赢，不以武力论英雄，而是着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大国

<sup>①</sup> 王存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红旗文稿》2017年第16期。

“修昔底德陷阱”和零和博弈的悲剧。二是超越了推崇国际制度的自由主义，中国在经济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经济质态、政治异态划分阵营、区分敌我、营造壁垒，而是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顺风车”，推动世界贸易投资持续自由化、便利化，缓解了美国逆全球化可能引发的世界经济秩序动荡。三是超越了推崇西方优越的文明主义，中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交往中，历来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破除了制约东西方、南北方经济融合的思想壁垒、文化隔阂，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高程度发展。

总之，伴随逆全球思潮的暗流涌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滞，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所预言的“地域史的终结与世界史的展开”，似乎正被逆转。但通过分析推动世界历史前行的双重逻辑——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我们发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仅没有过时，相反正自在地为这一深邃的历史哲学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场域。换言之，逆全球化并不是对全球化的否定，而是西方发达国家以一种短暂的回缩守势，为下一次更为迅猛的资本全球化进攻所做的策略性调整。面对世界大势的迷局和巨变，中国要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引，聚焦全球治理的新动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以“再全球化”有力对抗“逆全球化”，以“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替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 参考文献：

- [1] 程恩富、侯为民：《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红旗文稿》2018年第7期。
- [2] 张建刚、刘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 [3] 张雷声：《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 [4] 冯维江：《认清逆全球化思潮的谬误——不能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人民论坛》2018年第5期。
- [5] Xu Jian, “Globalization in Revers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2017.
- [6] 栾文莲：《对当前西方国家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析评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 [7] 周德海：《也论资本的文明作用——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重新认识》，《管理学刊》2017年第1期。
- [8] 程卫东：《欧洲是否会走向“逆全球化”之途》，《人民论坛》2018年第28期。
- [9] 胡博成、张平：《从逆全球化新动向透析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限度》，《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7期。
- [10] 曹帅、许开轶：《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理论探索》2018年第6期。

(编辑：张建刚)